

当代楚辞学研究的重要贡献

——读褚斌杰《楚辞要论》

黄震云

褚斌杰教授的《楚辞要论》一书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对历代楚辞学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分析,然后一一提出自己的见解,是本带有总结性的学术著作;更重要的是对楚辞的作家作品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创获良多,从而形成全面突破,成为当代楚辞学著作中成就很突出的一种。

楚辞学界时有重复研究以及难以深入而别裁的现象,不少还是不能自圆其说之作,学术界常有人为此感到气愤(参见黄震云《20世纪楚辞学研究述评》,刊《文学评论》2000年2期)。褚斌杰先生是中国楚辞学会会长,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楚辞要论》以其厚重的国学素养与学术品位,丰富的文献资料与理论高度,严谨求真的学风,对楚辞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对当代与今后的楚辞学学风的端正无疑具有指导意义,还将产生深远的积极的影响。

《楚辞要论》由历史文化、作家作品、学术史三个层面构成。从楚人、楚国与楚文化的广阔的历史层面展开,分析论述楚辞文体的来源与特点。以《史记·屈原传》为中心,全面梳理引证文献资料,详细地阐释楚辞产生的历史环境、作家生活、思想意识以及作品产生的时间、价值、文心。论证版本源流,对楚辞的流传与形成进行认真的探索求证,对作品进行认真探讨、解析,然后印证文献资料,提出很有价值的学术意见,还以专题的方式对楚辞的美学内涵、精神世界进行论述。构成了以传统国学与鲜明的理论思维相结合的研究特色,形成全面的多元的较为完美的学术结构与风格。

历代的楚辞研究都有作为,也出现很多的名家名著,成为我们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那么对学术史的把握就能够避免重复与具有一定的学术高度。《楚辞要论》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历史上楚辞

研究的成就与存在问题,然后展开论述,提出自己的见解。如“楚文化与楚辞”一节在论述楚辞与音乐的关系时对“乱曰”一词进行了归纳分析。首先对楚辞中的“乱曰”在作品中的位置、句法、含义等进行了总结概述。然后以《论语》、《诗经》、《礼记》的相关资料引证,说明“乱曰”的音乐品格。接着对历代的研究如章句、集注、注疏等进行评论,还与楚辞中的“唱曰”、“歌曰”比较,最后指出“乱曰”为音乐专名,形成信息量丰富、著书立说、论中有论的著作格局。

在严谨求真的基础上超越历史与现实的研究创见是著作最为夺目的价值体现。楚辞本身三万多字,历代研究的论著汗牛充栋,一般难以突破。《楚辞要论》的创新研究成绩显著,能够从难以研究处入手,取得进展。如《东皇太一》。东皇之名,汉代以前的典籍只有这一例,难以论证。从汉代的王逸到近代著名学者闻一多、钱宝琮都作出过认真探讨,形成宗教、哲理、星象三种意见,也有的认为是人神。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认为,太一不是神的名称,张元勋进一步指出这是对东皇的溢美之词。《楚辞要论》同意这种看法,然后更进一步研究,从楚辞中找到了《离骚》诏西皇、《远游》中对西皇的说明,结合《山海经》关于西皇的文字证明有西皇的存在。根据《史记》秦始皇派徐福至东海,东海人称之为“西皇使者”的记载,又结合《史记》与《左传》证明西皇是秦国祭祀的上帝,齐国也祭祀过上帝就相当于东皇。这些是周王室衰微以后诸侯寻找自己国家的保护神的行为,为僭越表现。这在《汉书》卷二十五上《郊祀志》也有记录说:“二年冬,东击项籍而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名曰北畤。”看来秦国祭祀的是历代帝王,

而^四就是上帝的象征,所以,秦国的西^四、齐国的东^四都有称帝王的意思。那么,楚国在南方,为什么祭祀东皇?原因是楚国由东夷的三苗迁入,所以东皇太一也就是楚国的天神上帝,反映了楚国具有成就霸业的主张。而汉代统治者是楚国的后裔,因此,到汉代随着国家的统一,尊神也统一为太一,三大祭祀为天地与太一。根据楚辞中表现的规模特征以及从礼器镇等的分析,祭祀东皇太一是国祭。最后充分利用出土文献中出现的许多神仙与祭祀对象的名称而没有东皇太一进一步说明这是国祭,非诸侯之事。在屈原担任的职务、楚辞的儒法思想的形成、宋玉的遗文真伪等方面的论述考证上也都有具有说服力的创建。这样的论证系统深入,资料丰富,逻辑严密,令人耳目一新。

楚辞的研究历来有大小之分,“大”主要是指楚辞与楚辞体(辞赋),专门的只限于屈原与宋玉及其作品。近百年来,从经学的屈原、历史的屈原到文学的屈原,逐渐形成综合研究的状况,但是,像《楚辞要论》能够全面地从楚辞、楚文化、历史传记、学术史特别是百年学术史的视野(而楚辞研究又包括作家作品、文献、历史、美学、文学、文体、文字音韵等多方面研究)进行研究,拓展了楚辞研究的领域,形成了规模体系,标志着现代楚辞学的成熟与发展。

传统国学方式仍然是当代中国古代文学学术研究的重要方式,而传统国学伴随着现代理论以及相关的学科知识的介入研究,成为当代学术研究的深度与高度的重要标志。《楚辞要论》以文字音韵学为工具基础,以思想史为线索,在历史文化的恢弘背景上展开,深入作家作品,把握学术源流,走的是传统国学的道路,但是又重点突出。由于楚辞的历史文献资料的不足,所以《楚辞要论》重点是作品的深入研究,字词句章,彼此关系都有细致的探讨,各种相关信息都进行了认真的比较。在比较探讨上,体现了求实客观的态度。北京大学历代都有楚辞研究的权威,如闻一多先生、游国恩先生、林庚先生都是这方面的名家,取得重大成就,形成很好的传统。因此在研究当中,自然更需

要学术勇气与科学的态度。这方面,《楚辞要论》也作出了表率。如对屈原的思想,郭沫若认为是儒家,游国恩认为是阴阳家,梁启超认为是道家,等等,《楚辞要论》详细地分析了这些意见的根据与合理性,又通过这些学派的特点区别,结合作品作家生活等,指出屈原生活的时代是剧烈动荡的时代,受到过多种思想学派的影响,也有楚国本土文化的特征,因此难以完全归入某一学派,此论比较符合历史的真实。对于近现代以来的二重证据法,马克思主义理论、美学、文艺学等方法,《楚辞要论》与传统国学方法能够有机融合,其在《论屈原 离骚 美学内涵》等专章,突出了理论高度与方法的全面。

195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楚辞研究论文集》大致代表了40年代以来我国楚辞学研究的水平。其中就有褚斌杰先生1953年发表在《大公报》上的长篇楚辞研究论文,至今已经有50多年了。据《序言》,褚斌杰在40年代由鲁迅《彷徨》中引用屈原的《离骚》文字而开始对楚辞的热爱与研究。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亲聆游国恩、林庚、浦江清先生的讲授,后来担任游国恩先生的助教,得到游国恩、林庚先生的指导,开始全面地研究楚辞。游国恩先生的考据训诂学,林庚先生的文学史观都直接地在《楚辞要论》中得到了发扬,因此具有渊深的学术渊源与基础,而新的理论方法的运用开拓了楚辞研究的空间领域。褚斌杰先生长期专注于楚辞学研究,成为当代此领域最有影响的学者,其著作《楚辞要论》则是长期全面研究楚辞的代表性成果。

褚斌杰先生在《楚辞要论》的后记中说:“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也将及‘不逾矩’之年,按规定,从教学岗位上‘致仕’了。因此,这本书也是我教学生涯的一个纪念了。”褚斌杰先生为人谦和,道德文章。对教学生涯的纪念与离开讲台的最后奉献则成了楚辞学研究新的高度,让人敬重与回味。

(褚斌杰《楚辞要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黄震云系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郑园)